

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



图为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。

1920年夏至1921年春,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,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,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,在上海、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济南、广州以及赴日、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,建党条件基本成熟,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。

6月3日,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,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。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、李汉俊取得联系,并交换了情况。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,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。

李达、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、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,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,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。

7月中下旬,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(今太仓路127号)的博文女校,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、学生模样的青年人,以北京大学学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,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。代表们到齐以后,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。

7月23日晚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(今兴业路76号)正式开幕。会址设在李书城、李汉俊兄弟住宅,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,室内没有特别布置,陈设简单,气氛庄重。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、李达;北京的张国焘、刘仁静;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;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;济南的王尽美、邓恩铭;广州的陈公博;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。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未在会出席的会议,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。

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,并发表热情的讲话。马林首先指出: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,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,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,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。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,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。接着,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,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,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,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。

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,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,并交流了经验体会。25、26日休会,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。27、28和29日三天,分别举行三次会议,集中讨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。讨论认真热烈,大家各抒己见,既有统一的认识,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,会议未作出决定。

7月30日晚,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,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,选举中央机构。会议刚开始几分钟,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,这次会议被迫中断。

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,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。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,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,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,任华人探长。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,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,虽经营救获释,但其行动一直作为“赤色分子”被严密监视。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,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“包打听”,建议立即停会,大家分头离开。

果然,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,法租界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,没有找到多少证据,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。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,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。转移出来的一大会址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,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,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,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,容易暴露目标。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: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,离上海很近,又易于隐蔽。大家都赞成,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。

第二天清晨,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。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,李汉俊、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,都未去嘉兴。10时左右,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,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,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。

这是一个阴天,下起了蒙蒙细雨,游人渐渐离去,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。11时许,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。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,先讨论并通过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》,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,确定了党的名称、奋斗目标、基本政策,提出了发展党员、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,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,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。接着讨论并通过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》,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,鉴于党的力量还弱,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,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,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,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。

下午5时,天气转晴,湖面上一般汽艇向画舫驶来。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,立即藏起文件,桌上摆出麻将牌,装扮成游客。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土绅的私人游艇,大家才松了一口气,会议仍继续进行。

最后,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,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,地方组织尚不健全,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,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,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,张国焘为组织主任,李达为宣传主任。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。会议在齐呼“第三国际万岁”、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声中闭幕。

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,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,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。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,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,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,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。(源自人民网)

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。下午5时,天气转晴,湖面上一般汽艇向画舫驶来。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,立即藏起文件,桌上摆出麻将牌,装扮成游客。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土绅的私人游艇,大家才松了一口气,会议仍继续进行。

最后,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,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,地方组织尚不健全,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,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,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,张国焘为组织主任,李达为宣传主任。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。会议在齐呼“第三国际万岁”、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声中闭幕。

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,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,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。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,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,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,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。(源自人民网)



图为浙江嘉兴南湖景区内停泊的中共一大纪念船。

“开天辟地”光辉历程的起点

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发起组纪事

20世纪20年代,上海法租界环龙路(今南昌路)和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之间,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,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,靠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,靠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,因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匆匆穿行,所以它被誉为“共产主义小道”。当年,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,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,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。

老渔阳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

1920年春,被毛泽东誉为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的陈独秀抵达上海,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(今南昌路100弄2号),他主编的《新青年》也随迁于此。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住宅,被称为“柏公馆”,坐北朝南,砖木结构,两楼两底,红漆窗棂比较典雅,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。陈独秀入住后,楼上厢房为卧室,也有书房;楼下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,一块小黑板上写着“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”;旁边的厢房就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,参与编刊的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夜战。不久,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,到上海会见陈独秀,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。

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,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。1920年4月2日,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,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《劳动者做觉悟的》演讲,指出:“社会上各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”,“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、最贵重”,并希望“做工的人快快觉悟”,第一步争取“改良待遇”,第二步“要求管理权”。4月18日,在陈独秀等支持下,上海中华工业协会、中华工总会、电器工界联合会、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、中华工界志成会、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、药业友友联谊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,筹备首次纪念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;会议决定在5月1日这天,除了电车、电灯、自来水、电话、电报等公共事业,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,工人群众列队游行以示纪念。4月29日,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《工界宣言》,其中申明:“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,因为五月一日,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作制幸福的日子。我们纪念它的意义,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;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。”5月1日,由于反动军警阻挠,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;下午3时,大会正式开始,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,挥舞红旗,高声歌唱;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,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。大会通过决议:一、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;二、组织真正的工会;三、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。然后,大会在“劳动万岁”的口号声中结束。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、大规模地纪念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。

1920年5月,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邀请邵力子、陈望道、李汉俊、戴季陶、沈玄庐、俞秀松、沈仲九、刘大白等参加,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,酝酿建党工作。那时,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,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,讲述了湖南改造促进会的一些计划,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,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;后来,毛泽东在陕北

与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见面时,说这段时间“是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”,“到1920年夏,在理论上,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,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,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”。林伯渠的《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》也回忆:“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,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……一九二〇年——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,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。”

1920年6月,陈独秀、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谈,决定建立党组织,并起草具有党纲、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,确定通过劳工专政、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;8月,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,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,定名“中国共产党”;11月,拟定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(也曾被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),由陈独秀担任书记,成员有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沈玄庐、杨明斋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李达、邵力子、沈雁冰、林伯渠、李启汉、袁振英、李中、沈泽民、董亦湘等。成员们常一起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,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
1920年9月,陈独秀把《新青年》改版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,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,开辟“新论”“通信”“随感录”等栏目;年底,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,该刊由陈望道主编,沈雁冰、李达、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。

1920年11月,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《共产党》月刊,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;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竖起“共产党”的旗帜,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,共出版6期。李达作为主编,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。1921年6月,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,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;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,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,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。

1921年7月23日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(今兴业路76号)召开。会议期间,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,地方组织尚不健全,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,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中央局,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。9月,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,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,常在此与中共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、宣传主任李达商量党的工作,并发表《中央局议决通告》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》等重要文件,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。

由于《新青年》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,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。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,陈独秀曾两次被捕;至1922年10月中旬,中

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北京。

新渔阳里 中国共产党党发起组重要基地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,对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,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(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)则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。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,两楼两底,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带饰带,门楣刻着“惟德是辅”四字,两侧有砖砌方壁柱垂悬。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,经维经斯基帮助,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色通讯社——中俄通信社,设于新渔阳里6号,由杨明斋主持。1920年7月2日,《中俄通信社》“世界要闻”专栏首次发表中俄通信社的《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》,相隔10多天,又发表《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》。从此,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,颇受各界关注。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,报道中国革命消息;同时,向我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,稿源大部分取自共产国际资料和赤塔、海参崴、莫斯科等地的报刊,少量转译英国、美国、法国的进步书刊。这类稿件种类繁多,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教、战事、工运、妇运等方面;形式多样,有长篇专访、连载、讲演稿、革命领袖介绍等。李达的《回忆党的早期活动》说:“中俄通信社”牌子是没有挂,“在1921年暑期终止了”,经考,“在中俄通信社在《民国日报》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,是1921年5月4日的《俄国贸易之过去与现在》,截至于此文,中俄通信社在该报过去发表新闻稿和电讯稿近70篇。”

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,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诞生。发起人是俞秀松(担任书记),施存统、陈望道、李汉俊、袁振英等8名青年,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。未一个月,团员就发展到30多名。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,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。团内每月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,由陈独秀、杨明斋、李达、俞秀松等作演讲,包惠僧是《党的“一大”前后》回忆:“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,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。”俞秀松常以多种形式鼓励团员们的政治热情,不少人踊跃参与筹建工会组织,工人半日学校,投入纪念“五一”宣传活动。与此同时,陈独秀还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寄往各地,请各地共产主义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;不久,广州、北京、天津、武汉、长沙、唐山、太原、济南等地陆续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起了中国青年团发起组作用,青年共产国际(又称少年共产国际)东方书记部曾在信中赞扬“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”。1921年3月,上海已有团员约200人,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,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,由俞秀松担任书记,机

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。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培养革命干部,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,由杨明斋负责,俞秀松担任秘书。1920年9月28日,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头版登载《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》:“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语各班,现已成立英俄日语三班。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,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,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,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。”其实,这只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,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团体推荐。外国语学社的学员,少时为二十人,多时达五六十人,其中有刘少奇、罗亦农、任弼时、任作民、萧劲光、李启汉、李中、谢文耀、庄文恭、许之桢、梁柏台、曹清华、韦素园、雷晋笙、陈为人、汪寿华、王一飞、彭述之、柯庆施、蒋光慈等。曹清华在《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》回忆:“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,地点是渔阳里6号。我同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蒋光慈(那时叫蒋侠儒)、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。那时,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学上课。课外分成三个小组,即安徽、湖南、浙江组。刘少奇、任弼时等是湖南的,王一飞是浙江的。我是河南的,只我一个,不能成组,所以编入安徽小组。”在授课老师中,教俄文的是杨明斋、库兹涅佐娃(维经斯基的夫人),教法文、日文、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、李达、袁振英;后来,库兹涅佐娃随丈夫回国,又聘同盟会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(也是张作霖驻苏俄公使李家鳌之外甥女)教俄文。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,半天自修或做工。在外国语学社,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不少外国学员。1921年春,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,分三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。外国语学社使许多学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,走上了革命道路。这是一群英姿飒爽的学校,在现知姓名的学员中,既有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罗亦农(历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、江西省委书记、湖北省委书记、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,1928年4月牺牲),也有早期党的重要干部谢文耀(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、南京地委书记,1927年4月牺牲)、王一飞(曾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、湖南省委书记,1928年1月牺牲)、吴芳(曾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、山东省委书记,1930年9月牺牲)、雷晋笙(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、山东省委书记,1931年4月牺牲)、梁柏台(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、最高特别法庭庭长、内务部代部长,1933年2月被捕,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,因在狱中遭酷刑身体受摧残,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,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)、傅大庆(曾任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

长,知名的“红色翻译家”,1944年7月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时被捕,抗战胜利前夕牺牲)等,还有早期青年运动、工人运动领导人俞秀松、李启汉、汪寿华等,以及翻译家、作家、诗人曹清华、韦素园、蒋光慈和经济学家周伯棣等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等担任重要职务。

1920年10月3日,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,由在海军造船所(后为江南造船厂)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。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,陈独秀、杨明斋、李汉俊、李启汉等以“参观者”身份出席,并成为“名誉会员”。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《上海机器工会简章》,宗旨是“谋本协会会员福利,除本协会会员福利”。会后,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(后门牌为自忠路225号,原建筑已不存)设立了临时会所。

永远的渔阳里

20世纪50年代初,南昌路100弄2号的建筑曾修复,对内对外开放;1959年5月,以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名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。后来,此处虽是几户居民住宅,但在底层厢房东墙一直保留着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碑,上面镌刻着: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,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……”2018年10月,这里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迁,开始规划全面修缮和展陈设计。如今,这里已设置“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(《新青年》编辑部)旧址”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,向公众开放。

1959年5月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;1961年3月,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89年5月,旧址修复开放;2004年4月,扩建为纪念馆,界内1—6号均纳入其范围。2019年4月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经8个多月的整体改造,分为6个展区,拓展许多功能;对石库门建筑的尖顶、室内立柱等,都进行了还原,还新辟了渔阳里纪念馆广场,建起总长58米、高3.4米的中国青年运动史大型浮雕墙。

在新渔阳里的弄口,上方“渔阳里”字样一直清晰可见;老渔阳里的弄口,曾找不到“渔阳里”字样,近期整修时拆掉长时期遮避的一块店招,灰浆墙面露出“渔阳里”三个字的痕迹。这两个相连的街坊,是中国共产党“开天辟地”光辉历程的起点,也是上海红色文化的源头。

当年,新、老渔阳里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,如陈独秀、杨明斋、俞秀松、李达、李汉俊、沈雁冰等曾在此奋战;毛泽东、林伯渠等曾在此留下身影;刘少奇、罗亦农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梁柏台、雷晋笙、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,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华优秀儿女;这里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,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、第一个红色通讯社、第一份党刊、第一个青年团组织、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、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、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现于此。史实证明,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,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。

今年,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回眸昔日渔阳里的风雷激荡岁月,令人无限感慨……(源自人民网)